

黄宗智对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及其价值

张剑平 戴晓洁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史专家黄宗智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范式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先后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陷阱”及呼吁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的理论等重要观点。黄氏特殊的学术经历、独到的研究方法、颇为新颖的学术见解是他受到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重要原因。黄氏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实证研究基础,触及了美国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黄氏的观点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于它适应了新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潮流。

关键词:黄宗智;历史研究范式;规范认识危机;四个陷阱;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35-07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教授在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农村社会以及清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最近二十多年来,对于美国和中国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曾多次进行深入的反思,先后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陷阱”及呼吁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的理论等重要观点。黄氏的一些观点曾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但有些观点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探讨,对其基本看法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忽视他的主张及其所产生的较大影响。本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论述,以推动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西方研究范式提出质疑

20世纪80-90年代初,在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特别是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黄宗智先后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华北》、《长江》)两部重要论著。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反思,黄宗智对美国学术界传统的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以及所遵循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在《华北》一书中,黄宗智提出,农民学研究中“形式经济学”“实体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三个

不同的流派。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流派认为,小农经济绝非没有理性而是具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做出适度运用的经济体,它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比拟描述。以蔡亚诺夫和波拉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流派则主张,小农经济不能以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利润算法不适于小农经济的家庭农场;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探讨。这个学派强调小农的集体行为,基本上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是为了对抗威胁生计的外来压力,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入侵。传统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他们是租税的缴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其生产的剩余用来维持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生存。在对上述三个学派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实证研究,黄宗智提出了自己的综合分析的方法。他主张: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

收稿日期:2012-02-13

作者简介:张剑平(1964-),男,陕西咸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戴晓洁(1965-),河北大学老干部处干部,主要从事党务研究和管理工。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HB2011QR35)及“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PRC006)的阶段性成果。

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的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其次,还需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黄宗智将小农划分为富农(经营农场主)、佃农和雇农、自耕农三个阶层,认为富农经济模式更接近于形式主义理论,自耕农经济接近实体主义理论,佃农和雇农经济则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采用的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1](P1-5)。正是由于在理论方面既吸收了各派的长处,又采取了阶层的分析方法,于是黄宗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黄宗智进一步论述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派别关于中国农村演变形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帕金斯和艾尔温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强调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认为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出现了边际劳动生产力的递减。受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影响的中国学者的分析模式则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此事实见证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 normal 发展。实体主义者蔡亚诺夫提出了一个独特完整的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变迁的模式,他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的情况,主要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的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革命前的俄国农村,主要循周期性“人口分化”型式变动,而不是循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强调的阶级分化型式而变化。由于资料的限制,这一模式尚未被系统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黄宗智则强调,必须兼顾考虑人口和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型式。他认为,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华北农村所经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向超集约化,也不是简单的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一个极端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中的阶级分化[1](P7-14)。黄宗智进而阐述了这三个派别在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上认识的分歧:即关于中国经济何以落后?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农村的影响?他指出“西方这三派的论说,虽然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但它们都忽视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之前的内在的变迁动向。”“我们必须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作用这一角度来考虑。单纯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或者把它当做一个类似实验室中可以随意加入和抽取的因素,我认为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帝国主义一旦侵入中国,即和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1](P20-21) 相比

较而言,黄宗智的看法更为全面和深刻。

在《长江》一书中,黄宗智将理论的反思进一步引向深入。他首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一经典理论提出质疑。他指出“尽管明清时代出现了蓬勃的商品化,处于糊口水平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简单的事实是,斯密和马克思从英国经验中作出的预言未在中国发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地方发生。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非但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延续,而且它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即使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小规模的小农生产远比英国持续的长久。”“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易言之,小农生产能够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认识明显是不对的。”[2](P4-5) 对于实体主义者蔡亚诺夫和形式主义者舒尔茨的观点,黄宗智提出反对意见。他指出“我们不能把蔡亚诺夫的小农家庭全靠自身劳动力来生产的模式抽象等同于明清时期的真实情况。……同样,舒尔茨的包罗所有劳动力的完美的要素市场等同于长江三角洲实际情况也是错误的。舒尔茨以及蔡亚诺夫的盲目追随者把实际情况等同于导师们用以阐明某些理论关系的抽象模式,造成了两个学派间的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是两者的混合体,包含着两套逻辑。”[3](P8) 进而,黄宗智提出了他的关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呈现着“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基本认识。

通过对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区域的实证研究,黄宗智对于流行的理论提出了反对性意见,这为他进一步深入反思过去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研究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观点。

二、“中国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说及其引发的学术争论

1991年,黄宗智教授在美国《近现代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中国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说的观点。该文在1993年出版的《史学理论研究》上摘要发表,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

黄宗智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最近数十年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悖论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的规范信念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他说:在中国学术界,“‘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

认识的危机”。在西方学术界,“‘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黄宗智明确说“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学术界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2](P413-421)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实证研究,黄宗智指出了当前的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存在着更多的悖论现象。诸如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处于糊口水平的悖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帝国主义所引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的悖论;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的悖论;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乡村过密化的悖论;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的悖论现象以及一条既不符合资本主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单一模式发展道路的悖论现象等等。黄宗智由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重要的理论认识的质疑,进而指出了一系列的“悖论”现象,认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些认识引发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1993年12月1日,《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邀约30多位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对黄宗智的观点展开讨论。会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发表了座谈会纪要。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规范认识”与资本主义萌芽、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过密化”与人口压力、增长与发展、关于黄氏研究的方法。对于黄宗智的观点,与会学者既有肯定的意见也有不赞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对黄氏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黄氏的这一揭示,不仅在明清以来经济史而且在一般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上,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大洋两岸的学人确实有必要思索一下长期以来双方所信守的约束自我认识能力的‘规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突破这一信念”[3]。一些学者不赞同黄宗智否认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并对他的“规范认识危机说”

持不赞同的态度。有学者指出:把商品化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作为“规范”,未免言之过重。马克思的确说过商人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但又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马克思从来没有肯定过历史上任何商品经济都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斯密的理论即“看不见的手”,主要是指市场能使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至于经济发展,斯密更重视分工和专业化。实际上,明确提出商业发展促成现代化的是希克斯。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是从商业出发的,商业发展影响一切。而斯密和马克思都是从生产出发的,生产发展决定整个经济。把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业的论述视为规范,就更不恰当了。有学者强调指出:我们说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迟早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感情,而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关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有学者指出,黄文屡次提到“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即使在江南,这种说法也过份了。到1840年前后,总的说,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占优势。清代以至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为了糊口而发生的交换,社会经济以至政治条件又不能促使它向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生产转变。这种商品化,即使是“蓬勃的、持久的”,要求它导致资本主义,甚至导致近代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也有学者指出:黄氏把中国学术界划分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封建主义论”两种对立的模式,但中国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把“萌芽”和封建主义的长期存在对立起来。黄氏对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的论证,主要用第二手材料,论据不多,较为粗疏。对于黄氏的“过密化”与人口压力的解释,既有学者赞同,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上述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关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近代化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是对黄宗智基本观点的一个回应。

尽管有学者对黄氏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诸多不赞同的意见,但对于他开展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和他所提出的观点还是做了积极的评价[4]。如学者指出“我们看到一位汇通中西学术,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独树一帜的学者,从扑朔迷离的史实和中外学界竟为轩轻的各家体系中,实际上在开拓出一条新的研究路线。”[5]“规范认识危机说”“这是黄宗智的研究对于我们最富启示性的一点:它从超越于彼此对立的现有各学派之上的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作为各派共同认识基础的一系列的缺陷,这触及到明清和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难题,而且也适用于整个中国史学领域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6]美国也有学者说:“不管你同不同意黄宗智的辩解,他已经令人信服地

战了西方农业经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生产者日常活动上。黄宗智的著作引导我们从以前被忽视的复杂性来理解农业经济行为。”[7]从上述学者对黄宗智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规范认识危机说”以及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认识尚有不少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但他所倡导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由于此,由刘北成、陈新为大学生编辑的《史学理论读本》,将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列入重要的参考论文。笔者认为,黄氏所指出的中国近代社会的诸多“悖论”现象,正是中国社会呈现出的独特的面貌,这也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由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的否定、中国有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怀疑、西方学术界对冲击—反应模式的质疑,进而上升到“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说”这些立论无疑是由特殊认识上升到一般结论的逻辑推论,这在理论方面确实留下了许多值得学者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为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并未将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对立,也未将近代的中国当做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去看待。由此,要断定过去的认识出现了危机,至少在中国学术界是难以成立的。加之有学者对黄氏立论的基础提出的质疑,使我们对黄宗智的“规范认识危机说”不能不产生疑问。尽管如此,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说”毕竟向中西方史学界提出了明确的挑战,促使中外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过去的理论认识与历史实际的差距、中国与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差别等重要问题,这无疑有利于历史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创新,这种启示比起黄氏的基本观点来说确实更有价值。

三、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理论运用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思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清代社会及法律制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黄宗智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文,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进一步提出质疑。

通过对自己多年实证研究的反思,黄宗智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理论运用方面存在着四个诱人的陷阱,即不加批判的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关于不加批判的运用理论,黄宗智回忆说“与我所读到的经验史学的学术著作以及1960年代我们中国学领域的状况相对照,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变化多端的和强大有力的。它完全不同于那时我们中国学这个狭窄领域中的专著。一旦接触到了理论,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所有的东西。……正是这种诱惑促使我把已经成型

的模式运用到我的研究之中。”由于对丰富的满铁调查资料的研读,黄宗智本人并未陷入不加批判地运用理论的陷阱中,即他所说的“我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的书采取了一个折中的路径,汲取了许多理论传统中只要有助于理解材料证据的那些看似零碎的东西”。关于意识形态陷阱,黄宗智说“学术理论不可能、也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自主的领域。理论公认是由统治思想左右的。……就意识形态影响学术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区别主要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在美国,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更加微妙,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在美国依然存在。”“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运用理论不可避免的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意涵。理论使我们思考一些更大的、更为一般的问题。但是这样做也不可避免的使我们进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领域。我们也不能避免由此激起的批评。这正是我们运用理论的代价。”[8](P104-109)同样,由于重视满铁材料以及对经验学术的偏重,黄宗智本人也未陷入到意识形态这个陷阱中。关于西方中心主义,黄宗智说“近代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欧和英美世界所支配的。无论是正统的概念还是反正统的概念都来源于这个世界。现代化理论源于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理想化地抽象为一个普遍使用的模式,而作为这种理论的主要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来自西方。20世纪出现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依赖的理论指导,并不是来源于本土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而是来源于异己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结合西方和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黄宗智明确指出“无论把中国放在与西方‘相等同’的位置上,还是说它是西方的‘他者’,同样的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源于西方;所宣称的主张也都是基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假定。”根据自己的实证研究,黄宗智说“从西方的理论观点出发,我们看到在中华帝国晚期许多相互矛盾的经验现象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意味着把中国化约为‘与西方相同’与化约为西方的‘他者’同样不符合史实。在中华帝国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业化和法制,这些与近代西方早期一样。但是,不同于西方,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式主义理性化。如同认为中国是西方‘他者’一样,坚持认为中国与西方一模一样也是错误的。”[8](P109-113)

文化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黄宗智着重论述的重要问题。他所提出的“文化主义”,既包括老一代的中国中心论,也包括最近激进的“文化主义研究”。黄宗智指出,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论的特征在

于“他们这些人穷几十年之功来掌握中国‘大传统’的文本。他们彻底认同一个古老的中国,有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和文明。他们沉迷于这样一些假定:中国有发达的文化,这些文化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他们不仅在智识上而且在情感上献身于他们所研究的主题。……他们对当代理论化了的社会科学的反应,主要是将它们看作是一些无关的东西而不予理会。”关于“中国中心论”的缺陷,黄宗智以汉学家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他说“完全将自己的关注点限定在上层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民。这种研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关心物质生活。它反对社会史,现在和以前一样,通常都是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驱使的。最后,这种研究在强调中国独特论的同时,实际上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这将使我们的研究领域限定在汉学的狭隘领域中。”[8](P113-115)“文化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黄宗智以萨义德和吉尔兹为代表予以分析。黄宗智一方面称赞萨义德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和有价值的观点,诸如主张本土的文化应当用它们固有的价值观念而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念来研究,同时对他怀疑和否定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以及提出的“事实只不过是表达”、否认对历史的真实再现等观点持不赞同的态度。他认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最终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对西方学术的反思批判。”关于吉尔兹倡导的“解释人类学”和“地方性知识”,黄宗智也作了分析。他指出“吉尔兹认为唯物主义的化约论使我们丧失了对符号意义和深层意义的洞察力,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只不过是一种唯心论的化约论。”“如果我们抛弃这些证据材料,就意味着抛弃了我们研究的主题本身,其结果要么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那样,仅仅用反思批判来取代历史;要么像吉尔兹的‘解释人类学’和‘地方性知识’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来研究‘地方性’的话语和表达。”黄宗智对于“文化主义”研究的质疑在于其极端的相对主义,他明确指出:“放弃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来寻求真理的理想,也就意味着放弃做真学问的任何可能性。”“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看法是,正如外来的建构一样,本土所建构的也可能同样与实际上所实践的完全相反。”“进一步讲,我们决不能否定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就有这样的趋势。”“对于我们这些近现代史学家而言,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无法容纳我们所要做的。”黄宗智对于“文化主义”的理论贡献和其严重缺陷的分析是极为深刻的,一方面充分肯定它在纠正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认识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对于他们放弃经验证据的极端性予以纠正。在反对激进文化主义的同时,黄宗智对于“新文化史”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他

说“新文化史对旧社会史中隐含唯物主义的批评是恰当的。它创造性地使用了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这些重要工具。同时,最优秀的新文化史的主要内容不仅考虑精英文化而且考虑民间文化,不仅考虑文化的非物质方面,而且考虑文化的物质维度。它并不反对经验调查,而强调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在理论方面,新文化史汲取了批判理论的洞见,但又没有走向极端的反经验主义和极端的文化相对论。”[8](P115-123)新文化史正是黄宗智心目中理想的历史。

黄宗智所提出的历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理论不加批判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以及作为当代史学重要流派的文化主义的优缺点,这些都是关系到中外历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黄宗智所指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陷阱”,是站在当代美国学术研究的前沿对美国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反思,也是他的“规范危机”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他的这些观点尚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但无疑向学术界敲响了警钟,有助于历史学研究进一步避开“四个陷阱”,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四、倡导建立从实践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理论

在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和清代法律实证研究以及对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黄宗智对于如何摆脱理论的局限性深入开展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黄宗智的反思主要是想对所谓的规范认识提出挑战、探寻以前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那么新世纪的反思则是立足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因而新世纪的反思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005年,黄宗智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专文,明确指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这一重要主张,这也是他认为解决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根本方法。黄宗智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二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黄宗智关注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中心主义、科学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冲击和质疑,他重视以布尼迪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践理论”对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理论的质疑。结合中国大革命

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以及费孝通对中国乡村的调查和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和法律实践独到认识的基础上,黄宗智明确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黄宗智指出:人们或用资本主义理论,或用传统社会理论来试图了解近现代中国,给予我们的只是隔靴搔痒的感觉。即使是在西方入侵之前的明清时代,也不符合马克思或韦伯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它充满了悖论的矛盾现象。因而他强调说: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工程,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工程,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逐步建立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9]。

关于如何恰当处理理论和经验的关系问题,黄宗智也作了深刻的论述,强调经验与理论连接。2007年,黄宗智发表长文《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这篇文章站在当代美国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对新保守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都予以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黄宗智强调说:只有特殊的学术模式,没有普适的理论;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也不是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经验与理论的双手并用,是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从新鲜的经验证据提升新鲜理论概念的历史学。从实践历史出发的认识方法,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验和实用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体现的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由形式主义(和其后现代主义)主宰的偏激认识观念,是一个可供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认识方法和理论所用的资源。它可以用来超越经验与理论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关键在于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一旦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10]。

关于如何扭转美国外国区域研究面临的危机,黄宗智强调要树立文化双重性的重要理念。2007年,他在《开放时代》发表《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黄宗智指出: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人们很难冷静地讨论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在近

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双重文化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一些杰出的个人身上,而且体现在一个长期的根本的变化过程之中。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存不仅已经发生了,而且使文化多元成为近现代史上真正巨大的趋势之一。如此看待西方文化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使我们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而把它视为一种结果未定的历史进程来理解。关于文化双重性理念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意义,黄宗智指出:文化双重性也许会对当今的危机起到某种作用。用学术化的话来说,它不同于各种“理性选择论”的方法,因为它并不主张现代西方所建构的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理性。它倡导要彻底地了解至少一种不同的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比较和批判的视角。同时,它也不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割据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而是双重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庞大现实。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并不会像帝国主义的政治史那样导致支配—从属的关系,而是会形成一种平等得多的结局未定、存在着各种创造性的可能的持续互动的关系。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割据的局面,可以扭转当今美国外国区域研究的不景气的局面和所面临的危机。正是文化双重性使人们能够超越自身的狭隘观念,并培养出比较和批判的视角;也正是因为文化双重性,才可能真正地作出跨文化、跨国界的选择[11]。黄宗智提出要树立文化双重性的重要理念,无疑有助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也有助于纠正美国和中国历史学界过去站在狭隘民族立场上对西方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出于民族情感所作出的不公正和不客观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纠正“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各自的弊端。因而无论是对美国的外国区域研究还是对中国学者开展的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五、黄宗智中国历史研究范式反思的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进入反思阶段,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在“西方中心论”观点影响下的“冲击——反应”的现代化模式不断受到新一代学者的批判。随之又出现了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论”。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和反思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学者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成果丰硕,并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美国学者对于自己的中国学研究的反思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黄宗智的多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他的学术观点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巨大反响,正是这种情况的

具体反映。与美国其他学者的反思相比,黄宗智在中国历史学界、经济学界的影响更大,他对美国中国学的反思更加系统和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黄氏特殊的学术经历、独到的研究方法、颇为新颖的学术见解是他受到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重要原因。黄宗智早年接受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学”的正规教育,70-80年代之后,又先后在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这一特殊的学术经历,使他较早关注到日本人的满铁调查资料,加之亲身深入到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又查考了珍贵的清代档案文献,使他的学术研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华北》和《长江》两部著作的相继出版,为他在美国和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也奠定了他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

其次,黄氏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实证研究基础,触及了美国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华北》《长江》和清代法律的实证研究,使得黄宗智赢得了中国研究的重要话语权。尽管中外学术界对于黄氏的看法仍有不少的分歧意见,但学术界对他的这几部著作基本上持赞赏的态度。黄宗智对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反思,既对传统的西方现代科学主义、西方中心论提出批评,矛头又直指文化保守主义、中国中心论以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他对各派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精当的分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些都无疑触及了各个学派的学术宗旨,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再次,黄氏的观点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于它适应了新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关注西方学术发展的新动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更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新面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何突破,是新时期中

国历史学界关注和探索的重要问题。黄宗智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不少历史学家正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因而黄氏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人的支持和赞赏,与此同时,黄氏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

综观黄宗智对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明显可以看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的反思持续的时间长,发表的论文很有分量。从1991年到2007年,黄氏一直在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式进行反思,他先后发表了5篇很具有学术分量的论文,显示出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献身学术研究的执著精神。二是黄氏所着眼的论题涉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所论述的问题包含了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构建过程,关系到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黄宗智既指出了从斯密到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又反对“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对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思潮也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黄氏既对西方的历史研究理论予以系统反思和批判,也涉及学术之外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黄氏所论述的这些问题,虽然主要针对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但矛头也指向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历史学界。关于如何摆脱美国外国区域研究的危机,如何解决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的脱节问题,黄宗智强调要结合中国历史的经验,走向实践的重建新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这些都是关系到中国历史学研究未来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黄宗智学术反思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是中国许多学人苦苦思索的问题,黄宗智立足于美国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广阔学术视野,提出了诸多宝贵的认识,不管我们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的主张对于中国历史学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中国学人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2]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3] 李向军. 黄宗智学术研讨会简述[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 (1).
- [4] 叶茂. 商品化过密化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工作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J]. 史学理论研究, 1993, (4).
- [5] 庞卓恒. 新的研究的开拓[J]. 史学理论研究, 1994, (2).
- [6] 王爱平. 规范认识和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J]. 华侨大学学报, 2004, (4).
- [7] 爱仁民. 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黄宗智对西方史学界的挑战[J]. 史学理论研究, 1994, (2).
- [8] 黄宗智.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9]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1).
- [10] 黄宗智. 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 开放时代, 2007, (4).
- [11] 黄宗智. 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J]. 开放时代, 2005, (4).

(责任编辑 陈朝云)